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

——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吴怀中

内容提要:“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关键词: 安倍路线 日本走向 对华战略 中日关系 新型国家关系

作者简介: 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16)03-0001-36

安倍晋三2012年二次上台以来的执政时期,正值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奔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①。有目共睹的是,“安倍路线”引导下的日本,不仅试图“夺回强大日本”、实现重新崛起的安倍版“日本梦”,也正从各方面对中国实现以上国家战略目标产生种种明显的干预和影响。与此同时,以双方的对外重大战略方针出台为标志,在安倍执政以来的三年多时间,中日在战略与全局层面上对对方的评估、定位、核心对策应该说已初步确立和就位,双方都竭力将两国关系纳入到各自一系列整体的大战略框架中进行设计和处理,以资于自己国

① 2016年开始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描绘了这一关键阶段的政策蓝图。

家顺利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总目标，进而在大国博弈加剧、权势格局加速调整的国际社会占据有利地位。^①

大约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以经济总量反转、定位调整为主要标志，包括相互认知、政策应对、依存程度、交往方式等诸多因素在内，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有诸多新特征综合而成的新时期，开启了或将持续较长时期的“新常态”阶段。常态是指回归到中日历史长河中基本由中国占据相对优势的关系状态，新是指过去没有的时代特征，并且是以上诸元素的综合之新。安倍执政时期被认为大约是从2012年到2020年前后，位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主要区间。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处于新时期阶段的入口区间，面临着双方经过“战略错肩期”的集中磕碰与磨合后能否导出积极后果及新型关系模式的重大局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将对今后两国关系格局及各自国家发展走势产生长远影响。^②因而，就此进行宏观上的“中期盘点”是很有必要的。

一、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

从中国的立场研究日本及中日关系，首先不可避免要回答的是，“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国力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中日实力对比，基本是何走势、会否出现重大的变化？如果实力对比情况出现了与现今态势不同的重大变化，即由目前中国占有相对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变为另外一种情况，则双方关系样态及相互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调整。同时，还要研判安倍推进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的实现前景与完成度，在中短期内（五年左右）将会呈现怎样的一种状态，是“半成品”还是“完成品”？因为两者主导的日本战略走向及前景，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一）日本的客观国情及发展前景

综合而言，日本在中短期内的国情现实和发展前景是：力量的高峰期已

^① 其中，作为中国学者尤要设问的是，中日关系中的“安倍现象”，即安倍强势推动日本全面振兴计划并对华展开全方位的、超过之前历届日本政府作为的博弈举措，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意义？仅是一个时期的特殊现象和个案，还是会反复出现的周期现象，抑或成为今后日本对华战略的基本规范与普遍指向？中日关系由此深度恶化并恢复艰难，在理论上是否有可能避免而现实中未能避免？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为何？等等。

^② 笔者2016年5月初以“安倍”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共得论文3453篇，但以“安倍路线”为主题词的论文仅有3篇，而对“安倍路线”下的日本走向及中日关系进行整体盘点的论文，则没有出现。

过，经济方面，存量不少、增量不大，难有大的增长与起色；军事国防突破及步伐最大，但仍受较大制约，很难变成古典意义上的完全型军事大国；政治“民主制度”仍能维持健全状态；国内社会治理问题渐增，但无碍平稳运行。日本的衰退包括美欧在内的西方相对衰落，是大趋势，但也必须看到，这种衰落是一个相对的、缓慢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

具体而言，经济方面，“安倍经济学”在连续强刺激政策之下，曾有较好短期表现，但结构性改革迟缓、世界经济减速、中日关系不畅，拖累了业绩改善。日本作为高度成熟的后工业化国家，很难恢复高速增长，少子老龄化与国内市场饱和决定了其发展潜力及余地已不大。三大严重的财政相关难题——公共债务、财政赤字、社保负担，中短期内都难以解决。^①“安倍经济学”主要的政策业绩，即日本近三年的经济总量（GDP）增长率分别是2013年1.8%、2014年0.5%、2015年0.4%，未来中长期的增长率大约在0.5%—1.5%区间，即在各方面情况比较理想的条件下，也只能是一种低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外界曾多次预测日本会重新崛起，再现昔日辉煌，但都没有应验。^②安倍内阁提出的综合增长战略及其颇具野心的数值目标，也只是把GDP从现在的500万亿日元（不到5万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600万亿日元，到2030年也只是800万亿日元左右。到那时，日本在经济总量上与美中两国将不处于同一等级。

尽管如此，中期十年内即2025年之前，日本总体上至少是典型的地区大国和全球经济中心之一，科技创新、工业产能以及由此驱动的经济潜力不可小觑，可保持GDP世界前三及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印度则很难超过日本（当前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左右）。^③日本的国力基础与实力水平，与过去历史辉煌期相比的相对位置是不降反升。例如，一战后二战前的世界五大国中，日本的钢产量是600万吨左右，其他四国最少的也是1500万吨以上，但现在，日本的工业产能在西方世界中一直位居第二。再过十年，日本相对于美、中的位序（尤其相对于中国）可能是下降了，但经济实力其实比近代

① 伊藤元重「日本は三大財政問題に面している」、『産経新聞』2015年4月13日。

② 例如，这类预测的著作有：米尔顿·艾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如何改变世界》，沈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Public Affairs*，2007；克劳德·迈耶《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③ 参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78—83页。实际上，更应该用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日本的经济实力，到2015年底，日本海外净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

史上最辉煌时期的表现还要好，不同于近代做法的是，届时其可能还是没有把大量资源直接用于国防军事领域。

政治方面，“西方民主制”享有普遍认同和运行佳绩（这在非西方世界中较罕见），虽然日本政局阶段性地频繁变动而难以稳定。在保守政治集团尤其是安倍内阁执政时期，“宪政常道”出现了诸多裂缝与漏洞，但这一“压缩速成”的日本版政治民主体制在可预见范围不会出现塌方式崩溃和根本性颠覆。

社会方面，社会治理和统合的问题增多，例如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价值分化、少子老龄化、地方凋敝等颇难解决的症结，但其演变成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从而引发社会失序、治理失范、大规模群体动乱的可能性不大，社会思潮以及一贯的国民性格总体上是要和平、求稳定。岛国生存空间狭小，民族性情专注、坚忍，非自觉“忍无可忍”，一般不会产生内乱，其社会具有均质型的稳定结构，文明及治理程度较高。

军事国防方面，受可预见的经济财政、国内社会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很难变成古典意义上的自我完结型军事大国，完全废除“和平宪法”面临很大阻力和障碍，统治层及行政权力在决定对外动武方面仍将受到国会及民意的制约，自由裁量权并不大。日本的财经与民意状况，也不足以支撑其成为世界军事大国。

特别是在关乎日本战略走向的军事发展方面，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会增加军费、适当强军。例如，增加军费到700亿—800亿美元是可能的（占GDP 1.5%左右），但很难走大幅增加军费及扩军之路。这主要是其出于对自身国家利益考量的结果：（1）加剧财政困难，影响涉及社保、医疗的预算平衡，易遭国内民意批评。（2）这实际是改变国家发展道路，而且日本人自己也觉得此路代价太大、行不通，因为如果引发军备竞赛及安全困境，则比现在的做法要更恶化日本的国际环境。（3）日本什么时候改变国家发展道路，这要到日本认为其赖以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复存在，安全和繁荣受到极大威胁、陷入极度不安全感之时。但日本现在仍认为，尽管问题很多、不安因素在增加，目前的国际体系及秩序尚属“宜居环境”。^①北冈伸一这位在日本主流社会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曾论述当今日本不可能走军事扩张及军国主义道路的五点理由，例如环境制约、代价太大等，至少在目前看来部分可信。^②

① 野上義二「スポイラーとチャレンジャー」、『外交』Vol. 28、2014年9月、9頁。

② 北岡伸一「戦前と現代、同一視は不毛」、『読売新聞』2013年9月22日。

(二) “安倍路线”的愿景——主观战略及政策取向

当前日本国家大战略，即“安倍路线”(Abe Doctrine)，有别于二战以来历届日本政府制定的非系统性战略，是一个综合集成的有机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主要由安倍政治学、安倍经济学、安倍外交学、安倍国防学等内涵组成(参见表1)。这个大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塑精神、革内政、提经济、拼外交、强国防，实现内求正常国家、外求全面大国，从而使日本重新崛起的目标。通常认为，日本是力不从心的处于衰落中的地区大国，并不是全球战略一极。然而，2012年底安倍二次上台后，一反历届政府的“政策故态”，采取综合举措，强势推动日本在逆境中崛起，谋求“夺回强大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主要玩家”，使日本“绝不做强国”^①。

表1 “安倍路线”的结构及内容

“安倍路线”——日本国家大战略				
总目标	维护并提升日本的安全、繁荣、价值，特别是谋求日本重新崛起。“夺回强大日本”，使日本成为全面大国并保持相应的地位和影响力。			
实现路径	安倍政治学	安倍经济学	安倍外交学	安倍国防学
主打内容	日本国家的“内部正常化”——精神文化与制度体制两个层面的“摆脱战后体制”。	以综合配套举措(尤其是“三支箭”)振兴日本经济。	“战略性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扩展国际影响力，提升日本地位。	“积极和平主义”、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防范威胁、保障安全。
涉华影响	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否定二战后成果及秩序、修改和平宪法的摩擦与斗争。	积极推动经济外交、主导经济规则与秩序、对华展开经贸利益争夺。	集中体现为在亚太及东亚对华展开秩序及影响力、软实力之争。	介入南海争端及地区安全事务，在东海加强防务建设。

安倍的战略宏图及政策构想，即安倍版“日本梦”，源自一个强烈的大国信念：日本必须尽一切可能保住地区和国际强国地位，日本应该成为一个与其他世界大国一样的“正常国家”，必须在振兴经济、提升国力方面积极有所作为。以安倍为代表的保守政治精英集团，不愿意接受日本逐渐衰落、被动或只能依赖其他国家才能保障自己安全与繁荣的不快现实，也不愿看到日本由于中国崛起而可能再次滑向东亚边缘的位置。他们认定，日本必须取消二战后对军队的限制，特别是修改禁止日本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的宪法第九

^① Shinzo Abe. “Japan is back”, 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条, 尽早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加强军事实力。安倍在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方面, 比其前任走得更远, 但也寻求更加对等均衡的日美关系, 并为“同盟之后”预留政策后手。^① 安倍推动的战略性外交(也包括预留后手), 试图在全球空间腾挪博弈, 为日本争取良好的战略态势和施策环境, 包括与印度、澳大利亚、北约和东盟有关国家等建立新的独立的准盟国或伙伴关系, 以及力争在东北亚打开颇受困扰的对俄、对韩关系局面。

与此同时, 日本把崛起的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在实现日本国家战略目标过程中需要全力应对的障碍性因素。日本国内一个愈加明显的政策思路是, 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进程中的最大“绊脚石”, 期盼通过加强自助能力, 搭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顺风车”, 拉拢与中国存在争议、对中国存有疑虑的国家等外交行为, 来共同威慑或牵制中国。

小泉下台到安倍二次上台, 即从2006年到2012年的六年间, 是中日关系态势发生大幅变化的阶段, 中国GDP超过日本, 美国似乎变得不再完全“一超”。小泉内阁时期日本对华具有的优越感, 到2012年安倍二次上台时已经产生很大动摇, 经过2010年和2012年的“撞船”和“购岛”事件发酵, 更是变成了强烈的危机感。安倍再次登台, 从唯物辩证法来看, 是历史的偶然但也是必然, 即便不是安倍, 类似的强势政治人物, 或早或晚也会被作为“公约数代表”来挽救日本的颓势和危机。所以, 当今日本国家战略及对外政策的大幅调整, 与安倍这位领导人出现的偶然因素有关, 也是国内外环境条件作用的一种必然结果。安倍在日本政治光谱里的浓重色彩是保守势力中的强硬派、右翼代表, 其政治倾向和某些做法, 不会让所有统治阶层或美国全都满意, 其个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动和节外生枝, 也会对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造成干扰, 但他所作所为的大部分, 基本聚合了国内共识与“美方要求”。对安倍推动经济及国力振兴、加强军力以及应对中国的措施, 日本政治精英层的大部分包括国内政治的稳健保守派、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派(亚洲国际派), 并没有持正面反对的态度。

(三) 主客观条件下的日本战略走向

尽管安倍主观上雄心勃勃, 意图重整日本的雄风, 让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大国”, 但作为中期结果可能性最大的仍是一种折中的现实: 日本成为一个与过去有着巨大区别却仍是“非完全型的大国”, 日本更大的发展不在经济与

^① 宫家邦彦『日本の敵』、文春新書、2016年、237頁。

社会，而在于容易形成增长点的军事与外交领域——但其实这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安倍的雄心壮志及“安倍路线”的愿景实现起来难度很大，在经济领域碍难如愿，即便在动作最大的军事安全领域，也还是只有部分实现或执行的前景。尽管安倍心中并不情愿，但这是日本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所以，“安倍路线”所导致的日本可能“将是一个心怀不满却又力不从心的地区大国”^①。

事实上，安倍领导的日本，是一个后工业化的成熟社会、一个日益老龄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其他先进的后现代国家一样，政治党派、官僚机构和私营部门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左右着日本的决策进程及执行程序。安倍尽管是强势且集权的领导人，但在日本独特的政治体制下也缺乏将构想转变为政策所需的充足资源。同时，应对经济复苏、结构改革以及财政整顿，可能已是他无法完成的任务，更不用说正面修改宪法和激进扩军了。如果要真正成为军事大国和美国的全球伙伴，日本必须大幅增加军费。虽然在安倍上台后日本逐年小幅增加军费，但实际上在其上台之前，日本曾经连续 11 年缩减军费。目前日本经济虽稍有起色，但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大量财政支出都将用于社保，能够用于军费的未来预算也不可能有大程度的增加。这一点，正如日本政府高官，像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所表明的，“为保卫日本，不走增加军费之路”，还是要“利用有限资源”，主要采取盘活存量例如对外加强同盟以及合纵连横的办法。^②

日本国家发展路线，从理论与现实的两个角度来看，大致有以下三种：经典的“吉田主义”路线，“完全军事大国 + 独立自主”路线，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微妙调和路线。现在看来，第一种已经式微，第二种仍属极端，第三种在较长时段内应是现实。

第一种路线，是指回到经典的吉田路线，即轻军备、经济中心、安全靠美。这种可能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日本实现与邻国的政治和解与战略互信，尤其与中俄两大国的国际协调，在东北亚次区域做到邻里关系和睦，彼此不用戒备与防范，日本因此不用整军经武，但这个看来短期内并无可能。二是中国发展非常顺利，美国没有绝对衰落且中美“新型关系”构建顺利，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成了事实上的“G2”。日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怎么竭尽所能发展军备也是无益、无望，遂打出白旗，倒向一种“绝望投降

① 阎学通 《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 101 页。

② 『読売新聞』2014 年 4 月 19 日。

论”。不过，这种情况，十年之内应无可能发生。

第二种路线，是指日本与中国非但没有和解且情况更糟，觉得美国又非完全靠得住，认为国际环境险恶无比——日本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不复存在或受到极大破坏，完全没有安全感，昔日历史中的那种绝望闭塞感再次袭来，非理性民族主义大幅抬头，右倾政治大行其道。因而，日本判定要走独立自主道路，成为完全“正常国家”——以重武装（即除了核武，战略武器基本配齐）、重新走向军事大国来实现自己保卫自己。这种情况，在中期十年内可能性很小。日本不乏极右思潮与右翼政治势力的存在，即右倾化程度比以前是加深了，但日本政治完全被此主导、不顾国内外环境及条件制约而无所顾忌地扩军好战，并为此完全废除“和平宪法”，目前看来还不现实。

第三种路线，是指以下几种基本情况的综合体：（1）在没有破坏经济发展结构、国内重大政策平衡的情况下，日本推进适度且重点的强军，在限定条件下“摆脱战后体制”、获得一定程度的对外动武权，例如完成对宪法第九条的部分修改，通过集体自卫权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行使武力，在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时（参加有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国际治安部队等）参与武装行动。也就是，日本实现部分国防“正常化”，成为非完全型的有限军事大国。^①（2）经济与民生仍是国家政治及政府工作重心，外交上基本维持国际协调主义，而不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暴走”并脱离国际大家庭。（3）与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国没有达成真正的政治和解与战略互信，而是依靠日美同盟、适当重武装及合纵连横来抗衡中国。面临中国崛起的持续压力——维持“走钢丝”政策、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没有穷兵黩武、正面对抗或碰撞冲突。应该说，这种情况，相较于前两种情况，十年之内应是可能性最大。

就日本国家走向来说，适度加强军力、调整军事部署、强化日美同盟、推动制华外交等举措，当前尚不具太过危险的政策意义。这些措施，在国际关系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动、大国崛起时，是周边国家可能采取的并非特别异常的举措。^②在对当前日本国家走向的认知与评估上，西方世界、国际社会与东北亚国家以及中国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在这中间建立某种平衡性认

① 添谷芳秀『「普通」の国日本』、千倉書房、2014年、101—136頁。

② 实际上，中国周边部分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举措无非是合纵连横、远交近防、政经分离。历史上，日本面对中国（当时是王朝国家）的统一、复兴时，大致也采取某些类似举措。

识似乎也是需要的。^① 在安倍内阁主导下，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历史修正主义等右翼思潮泛起，从战略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终究不是日本国家的福音，但尽管主观上有一些危险的思想苗头，客观上日本战后 70 年没有和外国发生战争，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至于日本有无长远性的危险、是否会发生“返祖”现象，目前尚无法断定，“日本政府如何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全球总体力量平衡的评估”。^② 日本国家走向发生巨大偏差并再次误入不可逆的歧途，成为自我完结型的军事大国乃至变为极度危险的军国主义国家，这种凶险的情况，至少中期内还不能成为现实情景。

以上对当今日本实力态势及发展走向的评估，就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而言，至少可以在如下两个方面得到结论：（1）日本很难再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且被美国及中国周边国家所看重和借重，因而其对中国是处于相对弱势，而不是处于绝对下风。因而，在未来中短期内，日本对华仍将不甚“服气”，抵制“中国主导”将是常态行为。（2）日本难以采取穷兵黩武、采取对外扩张的军事大国路线，发展经济、保障民生仍是其国内政治的工作重心，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其真实需求。所以，就纯粹的国家理性而言，中国在与日本的对峙博弈格局中，有可能与之建立较低层级的相对稳定、基本和平的关系态势。

① 美国政府、知日派（多为保守派或亲日派）人士，例如理查德·阿米蒂奇、傅高义、约瑟夫·奈、迈克尔·格林、迈克尔·奥斯林、杰拉尔德·柯蒂斯等，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或走向军事大国尚无危机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安倍是“谨慎的鹰派”“新现实主义”，推动的是有限“正常化”与扩军。参见：Michael Auslin “Japan’s New Realism”，*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16。Gerald L. Curtis “Japan’s Cautious Hawks: Why Tokyo Is Unlikely to Pursue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13。同时，美国的现实主义派战略家，例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对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抱有警惕，但也不认为日本会复活军国主义或在中短期内走向毫无节制的军事大国。参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30—245页。

② 参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245页。二战后70年的洗礼和改造，有没有改变日本民族的一些属性，现在判断还为时尚早。独特的岛国位置及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独特的民族基因、文化特性、道德观念、决策体系、思维方式等。当自觉处于危机、陷入困境时，其国内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并对外贸然采取武断行动。这就是鲁斯·本尼迪克特所云日本缺乏“绝对道德”、深受环境塑造而选择“和”“战”的特性。有关日本民族性的“后本尼迪克特”研究议题，如特殊性和普遍性、短期和长期现象、稳定性与突发性等，今后仍然有待深化、开拓。

二、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

2008年中日就战略互惠关系达成的共识中,极其重要的两条就是“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以及“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①所以,关于双方的相互认知与定位,在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表述得相当清楚,本已不是问题。但是,安倍二次上台以来,可以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及官方人士向日方反复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其如何看待中国发展、定位中日关系。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系统的根本的对外认知,就会导致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和政策设计。作为与中国有诸多纠葛的日本,其对华认知与中国自身定位之间存在严重错位^②,王毅外长在2016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中日关系而言,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③。这表明,中日关系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就事论事、就讨论或看待某个具体政策或措施,已经不能说清中日关系的症结和根本问题之所在,也导致难以提出有效的缓和或解决之道。

(一) 对华认知与目标设定

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兼有“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的特征。从世界历史来看,一个大国的崛起或崛起的大国,包括中国在内,自然要面临既有国际体系的限制和约束、守成大国的钳制、由此产生不安的周边中小国家的对冲,从而产生崛起进程中的种种张力和困境,这其中有自古以来国际政治力学决定的部分,不独见于中日之间。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欠债,其右倾翻案动向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但这与应对中国崛起采取的防范与制衡措施,在国际关系中可分而视之。中日在力量态势转换过程中产生矛盾和摩擦,乃不正常中的正常现象,对此问题须有辩证看待的眼光。

总的来说,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角度来看,作为守成大国,日本采取的是“防御现实主义”政策。即,战术上有攻势动作,战略上是守势行为,战术上的攻势行为往往是为了达成战略上的总体平衡。日本的做法是,

①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官网,2008年5月7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450471.shtml。

② 参见张蕴岭《多视角下的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第7页。

③ 《王毅:中日关系病根在于日本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新华网,2016年3月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3/08/c_11118266809.htm。

在预见中国强大后自己将处于劣势时，与对方实力上升采取同步升级的制衡措施，以取得力量平衡，确保自己利益及地位不受损害。^①

但是，日本的问题显然不在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而在于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显而易见：其反应（态度和做法）更激烈、谋划更系统、举措更细致，对中国崛起采取了全方位的牵制与全要素的竞争行为，明显超过其他国家通常意义上的一般性做法，在中国周边与局部领域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时甚至于美国。^② 根据国际关系学经典的均势理论，日本即便不与中国一起制衡最强国，也可以适当超脱并在中美之间选取一个有利的平衡位置，而不必那么卖力地配合“美国老大”压制“中国老二”。安倍政府对中国崛起采取如此立场的背后，难免有其相应的主观认知因素作为“知识支撑”。^③ 这种认知之所以强烈而牢固，是因为既有历史经验的沉积，也有现实利益的考量，还有建构主义主张的主观认同、价值偏好等情感因素的作用，是“历史记忆”“现实利害”“未来忧虑”等各种复杂原因的综合集成使然。^④

总体而言，安倍政府对中国及中日关系的总体研判可概括为五点：（1）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日本在总体国力比拼上正落于下风，处于不利地位，更关键的是这种差距还在拉大，天平继续向中国一方倾斜。（2）崛起的中国很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和利益造成风险乃至威胁，日本需要切实防范这种不测和危险。2012年，日本PHP研究所的知名报告研判中国的发展有“五种可能”，其中可能性较大的是变为“非成熟大国”。^⑤ 很多证据表明，日本精英层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此“自我实现预言”的正确性。（3）正如昔日东亚大陆的历史所示，中国经由统一、上升期后，发展也会进入平缓期或

① 日本民进党（当时为民主党）议员、曾担任首相助理的长岛昭久将这一战略概括为“远交近衡”，“衡”取平衡、制衡之意。参见：長島昭久『「活米」という流儀』、講談社、2013年。长岛本人曾表示与安倍、麻生拥有几乎同样的地缘政治观与安全保障战略观。

② 美国是全球霸权且国内产业空心化，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层级和意义非日本可比，但在应对策略的全要素性和细节上，往往做得不如日本。

③ 实际在安倍二次上台之前，日本的保守派政治家或战略家们，面对中日GDP反转以及中国崛起的势头，就开始提出强力应对的策略主张。这一现象在民主党野田内阁时期已经开始显现，例如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主导提出政策报告（「膨張する中国と日本の対応」、2012年），并曾面呈野田首相。PHP研究所战略报告（「日本の対中総合戦略」），比政府政策提前提出警示信号。

④ 以下认知的论据，出自日本政府战略和政策文件（安全战略、防卫大纲、外务省及防卫省的公开文件）、安倍及其重要内阁成员的著述及言论、安倍的藏书及日常用书、研究安倍的论著、安倍决策团队及重要智囊的对华观等。篇幅所限，原则上文中只列出不在此列的注释。

⑤ PHP研究所「日本の対中総合戦略」、<http://research.php.co.jp>。

陷入停滞期，“新常态”就可能预示当今中国发展遇到瓶颈而缓慢下来。^①（4）日本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质量与水平比中国高。因而，在美欧日主导的世界格局及国际秩序没有“变天”之前，通过对“综合手段”和“内外条件”的充分调动与运用，一定时期内日本可以经受与中国的对峙及抗衡，在博弈中未必会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利地位。^②（5）至少在中短时期内，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性市场之前，日本经济仍然需要通过汲取“中国红利”发展自己，需要基本稳定、大抵可控的中日政治关系为此服务。

以上五点，具体又可分为相对理性与日趋消极的两面。一方面，安倍政府对中日关系大局总体上有如下一定程度的稳健认识和判断：（1）中国崛起的进程无法阻挡，日本只能或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2）日本今后最大的战略问题是日中关系，这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日本需要对之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3）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极为重要，日本经济在中短期内要想有所起色，就需要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4）总体上要设法保持日中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应确立相处规则，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控机制。

另一方面，安倍对华长期抱有很深的情势误判和意识形态成见，难弃对抗意识与排斥心理，对中国的行为时或做出误认和误判^③。安倍的对华错误认知，典型的有以下几种：（1）疑虑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并谋求霸权，挤压日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认为中国在领土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已触动并损害日本的利益；（2）怀疑中国意图恢复昔日的“华夷秩序”，在东亚重新拥有历史上曾经占据的主导地位，并会重复昔日“王朝帝国”崛起路径——强盛以后则自然往外扩展“势力边疆”；（3）始终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将来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军力发展步伐加快，对日存在威胁；（4）深信日中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且日本“领先”，两国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④（5）认为领土争端及历史问题的发生，系因中国强大后改变“政策”而起，日本需要采取强硬姿态加以应对，如果示弱，将面临中国“改变现状”的更多压力。

① 日本有此判断的人不在少数，即便对华相对稳健和友善的人士。参见：宫本雄二『習近平の中国』、新潮社、2015年、215頁、225頁。津上俊哉『巨龍の苦闘』、角川書店、2015年。

② 北岡伸一『日本政治の崩壊』、中央公論新書、2012年、279頁。

③ 这种认知，并没有完全脱离当代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虽然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受前者的影响而成。参见王秀丽、梁云祥《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④ 就看待和处理日中关系时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成分和价值观成见而言，在迄今为止的日本领导人中，安倍应是最浓厚、最明显的，连与安倍同出自民党相同派系的前首相福田康夫，对安倍的作法也持有异议。据《读卖新闻》2016年5月24日报道，福田表示“对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应展现未来共同合作而不是排斥性的态度”，“如果认为跟话不投机的人谈了也没用”，就会在“好友俱乐部中故步自封”。

可以看到,安倍对华认知的两面性比较突出:消极面在其上台以来日益占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日本对华战略的底色和基本属性;理性面导致的政策表现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为消极面主导的政策服务并居于从属地位。这种认知导致的策略基本思路,实际上是重利益而不讲友好,推进“零和”博弈而非谋取共同发展,出发点是“趋利”与“防坏”(指突发事件等不测事态),而不是怀揣信念和真诚去力推“促好”和“共赢”。

受这些基本认知的驱动和规范,安倍虽没有以穷兵黩武及挑动战端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崛起,不想和中国撕破脸,发生正面冲突和战争,但所思所虑多为对华保持不冷不热、和平共处的疏离关系,推行趋利避害、为己所用的“政经分离”双轨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华“两面人”的姿态和特性。^①安倍由此设定的最主要的对华战略目标,集中在以下三点上:(1)经济上,用足中国机遇的好处,利用中国为自己的经济“输血打气”,以利继续在两国关系发展进程和格局中占据有利态势和位置;(2)安全保障上,防范中国的“威胁”,平时以有力的“威慑体系”防遏两国冲突,同时确保万一冲突发生可有足够能力应对;(3)战略上,也是顶层目标,维护西方主导的体系和秩序,防止东亚“变天”即政经秩序被中国主导的局面出现,维护日本地位,塑造利日格局。^②

(二) 当今日本对华战略的基本内容

自对华双边关系正常化后,美日对华大战略的标准内容选项就是接触与防范,安倍政府的对华战略也概莫能外。这两大内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侧重,演变到当今就变成实现以上三大对华战略目标而施行的四大策略。^③

第一是“稳策”,指通过必要的沟通与交流,使矛盾和摩擦大致可控,保持双边政治关系一定程度的稳定状态,增加可预期及可控系数,在低层次上维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格局。广义上,稳策也包括日本并不抵触的危机管控及海空联络机制的构建。日中关系长期紧张或过于震荡、陷入“政经双冷”局面,结果是两败俱伤,将影响到日本自身的根本利益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包括声誉、威信的严重受损将使日本“入常”、成为“政治大国”之

^① 参见《王毅:中日关系病根在于日本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新华社,2016年3月8日。

^②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13年12月17日、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icsFiles/afidfile/2013/12/17/20131217-1_1.pdf。

^③ 也有意见认为,日本对华大战略的内容应该是由内外举措组成的统筹方略,例如美国的迈克尔·格林提出的“内外双重制衡”。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是指富国强军的自强措施,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是指加强日美同盟、海上联盟以及构筑“朋友圈”等措施。但是,自强措施更应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范畴,否则将使对外战略的研究内容过于繁琐而缺乏针对性。参见:Michael Green “Japan Is Back: Unbundling Abe’s Grand Strategy”, *Lowy Institute Analysis*, December 2013。

路更加遥遥无期，也将使对维持政权来说极为重要的经济振兴计划受到一定影响。而如果是全面交恶或正面冲突，那结果就不是安倍执政前途的问题，而是日本国家难以承受的代价。这些已是日本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安倍有关日中关系“交流”“安定”的言论，例如所谓“不管政治上发生什么问题，都要见面和会晤”，似有真实需求的一面，为此，其本人并授意朝野人士一再寻求与中方见面沟通的机会。考虑如何与中国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实际上不是安倍的“政策专利”，而早已是近年每一任日本首相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喜欢与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客观面对并必须应对的事实。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等问题的发生，客观上造成了中日关系难以行稳、向好，但安倍主观上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

第二是“用策”，指用足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分享红利，提振日本经济，确保日本的实力基础。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外需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至少中短期内借中国之力来保持经济活力的基本框架已是日本战略刚需。随着中国对外进出口快速扩张和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局面在日本少子老龄化和内需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今更加明显，即使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也没有太大改变。^① 由于政治关系恶化及经济规律的作用，日本已开始将投资目标转向东南亚等地区，规避“中国风险”，寻找替代市场。但是，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效果和市场效益没有充分释放之前，日方对华仍在设法维持一定的稳定双边关系和贸易投资环境，譬如试图与中国举行“日中经济高层对话”、组织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等等。因而，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即便中日政治关系基本陷入“政冷”僵局，从2013年起日本对华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呈同比下降状态，但绝对总额仍保持相当的规模，三年间的平均投资额仍达50亿美元以上，双边贸易额也维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同时，虽然进展不顺，安倍政府也并不正面排斥中日韩自贸协定（FTA）的建设，迄今三国已举行六轮谈判。亚太地区当前任何形式的区域合作，都不会比中日韩合作给日本的经济利益带来更实惠、更直接的促进效果。日本深知“重返亚洲”、加强日中韩合作是其国家利益所在。

第三是“防策”，指广义的防范——防备中国成为“威胁”或即使成为

^① 参见陶涛《日本经济增长对中国需求依赖的估算》，《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第87、95页。

“威胁”后能加以应对^①，思路是总体要均势、局部抗得住。防范之策的内容可分为如下三件套的组合拳，这些本是近年来日本防华的“题中之义”，但安倍二次上台后对此全面展开、大胆推进，却是冷战后两国关系史上未有的。

(1) 瞄准中国，加强自身军事能力建设。“安倍国防学”的三年业绩，包括在战略、政策、法制、体制、编制、装备、战术、部署等领域的综合举措，基本与此有关。其中引人瞩目的有“软件”方面，制定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通过新安保法，时隔多年后连续三年增加防卫预算，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和武器出口禁令；“硬件”方面，逐步加强远程攻击能力，包括大型先进的进攻性武器；军事部署及防务态势方面，加速推进西南群岛军事部署以及第一岛链要塞化。(2) 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实施对华威慑。2015年，日美时隔18年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深入推动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安全合作，联手在海洋问题上压制中国，对华要求“遵守”国际法和涉海规则。日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国际安全行动，以“对美有用的身份和角色”换取美国的对日安全承诺及行动。^②(3) 合纵连横、拉“朋友圈”，以统一战线战术制衡中国。具体做法有：积极开展“日本+N”及“日美+N”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推动构筑以日本或日美为中心、以海洋问题和民主联盟（价值观外交）为两大抓手、连接澳印韩和东盟甚至北约的宽泛安全合作网，以此宏观均势实施对华平衡和牵制。安倍及其内阁重要成员在与东盟各国、中东中亚及欧洲各国、印俄澳等国进行安全会谈或磋商时，一边积极提倡多边及双边安全合作，一边影射或剑指中国，其意不言自明。

第四是“竞策”，广义上指围绕秩序、利益、价值观和影响力展开的对华竞争或压制。实际上，这是日美对华大战略中的接触与融合部分在力量格局发生变化下的变调形式：在日美软硬实力对华占据较大优势的情况下，此策更多地以诱导、助推中国融入秩序的面目出现。但是，当切实感受到中国崛起的综合压力时，日美将相对柔和、自信的接触策略，逐渐调节为软中带硬、

^① 日本一些精英认为，以日本现在的能力还能勉强应对“中国威胁”，问题是未来前景。如果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中美G2格局，日本的安全将堪忧。参见：白石隆「アジアの盟主を目指す中国に対抗できるか」、『中央公論』2015年1月号、57頁。

^② 尤其到了安倍政府，日本尽管竭尽所能加强日美同盟，但对于美国在关键时刻能否真正保护日本，仍存两大疑虑：第一，日中发生冲突，美国面对“有核中国”，能否真正介入助日？第二，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中美国力更加均衡化，中美“战略交易”之下美国部分退出西太平洋也有可能。

以硬对“硬”、总体竞争、全面压制的方针，变为通过竞争与压制、阻止中国“挑战”秩序、迫使中国“遵规守则”，即严厉地“管理”中国的崛起。这些竞争，主要围绕政治、经济、战略三大领域展开。

在政治领域，围绕影响力和地位展开竞争。这主要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对华竞争，以确保不因中国崛起而导致日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下降，力阻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资本被挤压。安倍政府“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行为，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不在少数，政策工具则有价值观外交、海洋外交、发展援助外交、全球治理外交、非传统安全外交、裁军与军控外交等。具体而言，例如，强化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有关国家及北约的准同盟的友好伙伴关系，推动“围堵中国”的价值及利益共同体。在非洲、东南亚、中东、中亚等重要地区，通过投资、经援、免债、救灾等软实力行动，释放善意，塑造形象，与中国全面竞争影响力。而在亚太多边磋商和对话机制中，则往往以事涉中国的海洋、网络等议题为由头，或频频配合美国，或声援东盟有关国家，通过主导议题、设置议程和抢夺话语权来扩大和提升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经济领域，围绕海外市场和商务利益展开竞争。在经济状况良好时代，日本将经济力作为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经济为政治服务。但是，在经济陷入衰退并面临中国竞争的情况下，正如安倍每次出访都要带上庞大的商业团队，政治改为经济服务，外交为保障市场、改善投资并争取大型建设项目服务。为此，日本展开的具体行动有：（1）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对抗性措施，围绕高铁、公路、核电、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展开“逢华必争”的抢单大战；^①（2）整顿、统合国内的支持机制，例如宣布提供1100亿美元援助亚洲基建项目、设立官方和半官方的投融资集团等；（3）着眼于长远的预期收益，推动各种有利于日本的高水平自贸体制，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EPA）等的尽早成立；（4）推动日本投资从中国转向东南亚等地区，在规避所谓“中国风险”的同时，积极寻找替代市场和利益产出源。

在战略领域与顶层设计上，主要围绕格局与秩序展开对华竞争和挤压。其目标，是最终把中国的进步发展纳入西方设定的轨道，使中国在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势力主导的体系中“遵规守则”、成为“负责任大国”。日本政治精

^① 例如，安倍在2015年5月宣布推出1100亿美元的日本版“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助计划”。

英认为，作为“先进的稳定民主势力”，维护亚太乃至全球的既成秩序对其来说是国家的大战略。^① 2012年底安倍上台执政以来，亚太秩序及格局经历深刻调整，对地区秩序权力转移历来敏感的日本，以制定规则、抵制倡议、搅局南海“三管齐下”的方式，对中国崛起下的权势转移展开强力战略抗衡行动，意图维护日美主导的地区秩序不倒。^② 日本为此采取的应对方针，一是配合美国维护既有秩序，二是以堵压方式使中国“遵规守则”。^③

在维护秩序方面。首先，全力配合美国，推动耗时多年的 TPP 谈判于 2015 年 10 月基本完成，意欲重塑世界贸易规则和亚太经济秩序，凭此对华掌握经济秩序制高点和规则主导权，有效攫取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其次，配合美国，明确表示质疑并抵制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倡议。在亚洲地区，对这一倡议持如此立场的，也只有日本一国。2015 年 5 月，正值中国筹备亚投行之际，日本宣布比亚投行预计资本规模还要大的对外援助计划，公开较劲亚投行。再次，虽然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但日本与美国一样都认为自己是南海海洋秩序乃至美西方霸权秩序的坚定维护者，皆以所谓秩序维护者的姿态介入南海事务，维护所谓基于国际法的海上航行自由等权利。

在堵压中国“遵规守则”方面。以强硬封堵代替柔性劝诱，是美日的广义接触政策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发生的指向转变。广义的“接触”政策历来有两面：一是指“融合”，即接触实施主体处于强势时展开的拉拢、鼓励、吸纳、融合措施。二是指“压阻”即“强硬接触”^④，即对强至一定程度的被接触国家施以竞争、劝阻、围堵和制约的方法。日本某些政治家及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中国不遵规守则，破坏秩序，那就要让中国付出高额的代价。^⑤

① 山本吉宣·纳家政嗣·井上寿一·神谷万丈·金子将史『日本の大戦略』、PHP、2012年、337—365頁。

② 日本如此重视维护秩序与格局的原因在于：（1）这个秩序是世界主导秩序，日本在这一边守成，而中国等崛起国在这个体系中的被认同度与位序逊色于日本，守成方具有较大优势，作为守成一员日本具有高位优势与阵营后盾；（2）实际上日本也认为，这套秩序更能维护其利益，对日本来说，比中国可能主导的秩序更有可预期性，收益和保险系数更高；（3）在日美看来，近年来，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开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民币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的发生、亚投行成立等，都集中体现为西方主导秩序面临挑战和冲击的重大问题。

③ 日本对中国主导东亚秩序的疑虑和抵制，不但来自于对现实的判断，部分也来自于历史记忆及经验。参见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28页。

④ 丹尼斯·布莱尔、前田宏子《强硬接触：美日对华战略升级版》，美国《国家利益》2016年5月2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6年5月24日。

⑤ 日本学者将此称作“成本强加战略”，显然是借用了美国政策概念用语“cost-imposing strategy”。参见：神保謙「アジア太平洋安保 中国の台頭平和的に」、『読売新聞』2014年3月28日。

安倍的重要外交智囊兼原信克和谷内正太郎曾说过“能否将中国转变为对现存国际社会和亚太负责任的领导国家,是这个世纪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也是日美同盟和民主国家全体无法回避的课题”,“对此加以推动的,就是日本的接触政策”。^①但是,当今日本的对华接触政策,尤其2012年底安倍内阁诞生后,明显向后者的“压制”倾斜,即在短期内无法指望中国自觉地全部融入并顺从西方主导体系与秩序的情况下,为了让中国“循规蹈矩”和“负责任”,更多的是采用并依赖围堵和压迫的方法。^②其目标,是让中国无法突破而只能最终接受并顺从这个体系和秩序,从而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日中关系形态。实际上,日本的这一举措,与近年美国政界和战略界主张对华重新开展评估、采取严厉应对措施是同步进行的。^③2015年4月重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出“日美两国政府为维护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基于国际法的海洋秩序,将相互采取紧密合作措施”^④,也绝非偶然。同月,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的第一条,就是直接申明“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⑤。

三、中日关系大势与日本定位

对上述“日本因素”进行单向评估,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这也需要在双向互动、互为作用的情境中把握两国关系的格局特点和阶段特性。这种把握,既离不开在大历史中考察现阶段,也需要看到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即与过去不同的变化所造成的现阶段特性。^⑥具体而言,从处理双边关系尤其是理清对日关系思路的角度来看,需要评估日本对中国来说的正负相关性,即正面影响的利益有多大、负面影响的威胁有多大的问题。并且,探寻双向互动关系(不是单向、单方面)的共性

①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日経新聞出版社、2011年、361頁。谷内正太郎編『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ウェッジ、2011年、84頁。

② 北岡伸一『日本政治の崩壊』、308頁。

③ 安倍晋三『日本の決意』、新潮出版社、2014年、13—21頁、39—58頁。

④ 「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2015年4月、<http://www.mod.go.jp/j/approach/ampo/shishin/>。

⑤ 这些评估,例如有2013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30年中国军事与美日同盟》、2015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布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等,后者主张美国应该采取新的对华大战略,即从两面下注转向积极反制,核心是平衡而非扶持中国的崛起。

⑥ 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两国关系,对当今中日关系来说,缺少可比性和经验性。

特征，即双方可能的妥协点、互让区，也是建构双边关系处理之道的必要前提。

（一）中日关系大势研判

1. 大历史与宏观视野下的“新常态”

2010年日本GDP被中国赶超后，中日关系态势进入中国整体上相对强大的“中强日弱”格局。不过，就意识形态、经济科技、常规军力、社会治理、环境水平等而言，日本认为是它领先，有一种“以质胜量”的自负感觉。中国体量巨大，占有相对优势，但以此优势形成的自然的政经影响力也难以覆盖或吸引日本，日本以强烈抵触心理及综合抗衡措施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地位与影响力的上升。当前以及将来一段时期，中国难以形成对日本的全方面高位优势和文明文化的输出格局，在综合软硬实力上不易让日本真正服气，双方之间形成了某种非均势的战略对峙局面。除此之外，以下纵横两个维度的视角也有助于更好地观察此现实。

第一，就纵向的历史经验而言，正如中日历史长河中的规律性现象，当今中日关系有可能进入了一段较长的过渡时期。隋唐之后，中日在东北亚就展开了或明或暗的地缘政治竞争。宋元以降，大陆文明及力量已难以使日本全面服帖、崇敬。日本的历史感觉里，当代中国对日本的“文明优势”和“上国地位”还远未恢复至农耕时代那样的高低态势，东亚的“中国秩序”并未成立。^① 并且，当今中日两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相遇，也很难以武力方式在双边关系博弈中获取优势。

第二，横向的国际格局，对于中日也是各有利弊。在东北亚次区域，日本已感很难单独抗衡中国的崛起，但在一个开放（而非像近代史以前的东亚封闭系统）的全球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日本可以借助的外援较多——这种资源在和平时期对中国的崛起确有较大牵制作用。日本背靠日美同盟和西方主导秩序的优势，采取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之策，大体维持了一种弱性对华战略均势的局面。至少日本认为中国当前很难撼动、颠覆西方主导的体系及秩序。^②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推动地区合作框架从东亚（“10+3”）到亚太、印太（“10+6”“10+8”），目的之一就是把日中关系的分母做大，通过这种“稀释”动作，在更大范围动员更多资源来平衡中国、以求“扩大均势”。

^① 白石隆、ハウ・カロライン『中国は東アジアをどう変えるか—21世紀の新地域システム—』、中公新書、2013年、37頁。

^② 中国领导人也提出“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参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正因如此,安倍2012年底上台后,旋即发出“东海和南海正在发生的争端表明,日本外交的顶级优先事项就是要扩大国家战略地平线”的疾呼。^①

所以,从历史纵轴与国际横轴的脉络看,中日之间的战略对峙与综合博弈格局将持续一段时期。这种非均势战略对峙的中日关系态势,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新常态”。中日回归到历史上两国之间最长期、最常见的“中强日弱”态势,中国体量庞大并占有相对优势,而两国关系在新时代条件下形成了与过往常态所不同的新特征,而不是过去常态的简单复制。

“新常态”由在中日关系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没有同时存在过的四种表现样态组成——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惠互利、往来不绝。和而不同,指战略及政治关系上有对立、摩擦但寻求基本稳定;斗而不破,指在军事安全领域,包括在部分争端上有对峙、争斗但难以发生正面战争;互惠互利,指互通有无、正常的经贸关系以及相互依存;往来不绝,指人文及社会交流规模大、密度频,但情感及认同未必亲近与融洽。

这种新常态下,中国虽然占有较大优势地位,但也无法全面“压服”或“吸引”日本,中日关系很难形成类似目前美日关系的那种状态。中日之间的文明水平和综合国力没有形成很大落差、体系格局没有决定性地产生变化或这种变化的前奏没有明朗之前,从历史经验以及民族性来看,日本很难主动大幅度调整自己的政策来适应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政治关系及区域秩序上采取顺应的姿态。^② GDP相对之差会导致日本倒向中国,认为存在这种中日关系自动生成模式的看法不免乐观。对日本心理和行为模式的规律,有时需要进行历史长线的总结和评估。当前,安倍政府拒绝进入中国倡议的地区合作构想,竭力抵制东亚事务为中国主导。未来中近期内,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日本可能会从现在的“安倍模式”,即政治上绝对的“联美(或日美+N)制华”,向较为明智、均衡的“日美同盟+日中协调”做一些调整和转换,但还难以看到日本“脱美入中”、在中美之间重做选择的前景。

^①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2016-2-3.

^② 历史上,中日之间的大麻烦一般是在两种情况下(个别例外,特别是过去信息闭塞,岛国日本不明外情,误判误撞)发生的:(1)中国(开始)衰弱,显示弱势或破绽,日本恰巧国势隆盛或首领强势,萌志窥华而击之,典型的是甲午到抗日战争这一段,广义上的还有明末之战;(2)中国统一、复兴,恢复东亚大陆主导态势之际,处理“日本位置”即中日政治秩序时的棘手,典型的是隋炀帝(以及唐初)、明洪武帝时期的中日关系。从历史经验看,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后一种情况的中日关系。

2. 邦交正常化以来战略关系的重要变化

安倍二次上台以来，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战略性变化，这直接影响到中日能够建立何种关系的问题。从中日复交后 40 多年的节点来看，中日战略（政治与安全）关系已发生了明显的“重心位移”。当下两国关系面对的正是这个小时段的严峻现实。

首先，中日政治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质，对手性质成型、固化。小泉内阁时期日本带有自信地宣称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而到安倍二次执政时期，2013 年日本制定二战后首个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政府总体角度系统提出了对华方针和防华策略。同年出台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针对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威胁”。中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一再敦促“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①。当前中日之间相互的战略疑虑与戒备，要比复交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强烈和明显。

其次，安全关系上的非良性变化应当是最明显的，“中日关系也开始军事化”，“中日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出现”。^② 日本 2004 年版、2010 年版的防卫大纲都提出了重视西南、加强“岛屿防卫”理念，但实际举措并没有跟上。近年日本针对中国的军事防范措施，在 2013 年版防卫大纲指导下，则是真抓实干、快速到位，例如正面推动整军经武、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强化西南群岛的军事部署、介入涉华地区安全事务等。2015 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及日本通过新安法，进一步加剧了双方联合制华的态势。由此，中日之间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比以前大大增加，中国政府也前所未有地一再就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及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提出担忧和忠告。^③

再次，中日国民的相互感情与认知恶化并下降到两国复交以来的最低点，经贸来往的数额也是连续下滑，“经温”局面渐显。这两者都有作为双边关系“压舱石”和基础的作用，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相处之道的确需要重新思考和认真总结。

以上几对关系短期内虽有表面缓解可能，但内里的改善将非常困难。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安倍执政以来的中日关系，总是难以真正稳定和改善。

^①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网，2015 年 4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2/c_1115057889.htm。

^② 参见王缉思《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第 174 页。

^③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98011.shtml。

(二) 关于日本对华的正负相关性评估

中日关系中的日本定位和定性,也就是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问题,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判断基准。有关这个问题,总的结论是,日本对于中国的总体作用和重要性没有下降。没有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正面或正能量作用下降的同时,给中国发展和崛起带来的负面或负能量作用上升,导致总体作用和重要性之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过”与“不及”的判断,都会对看待与处理中日关系带来影响,而目前这种负面重要性的大幅上升,或许意味着中国对日关系的中短期目标和重心需要做出适时的调整。

1. 日本的正面定位与影响

日本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时期,是如下已经历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日本绝对强大,而中国弱小分裂、面临被侵略的境况;第二种是中国国际处境面临困难,需要两国关系缓和的局面;第三种是改革开放当初,亟需日本资金、技术和经验支持现代化的阶段。尽管如此,对日本正面重要性认识的结论,大体是日本兼具周边与大国的特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重要。这大致从两个方面得到反映:(1) 中国对日方针和原则的口径未变,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对日要“建立稳定友好关系”等。(2) 日本企业通过投资和贸易等方式提供的资金和技术,为中国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来说,日本则是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外,在华日资企业约达2万多家,创造出巨大的就业与税收机会。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十三五”实现转型升级、“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艰巨任务。^① 这些任务的顺利完成,需要日本发挥更加积极的正面作用。

2. 日本的负面定位与作用

日本政府像过去那样对华采取相对友善态度、“为中国改革开放出了相当的气力”的正能量意义上的重要性在减少^②,负能量意义上的重要性在增加,也就是阻扰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负面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著。不过,在判断日本对中国崛起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威胁”究竟有多大的问题上,中国国内各界存有一定分歧。对日本究竟给中国带来多大威胁实质的问题,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7—139页。

^② 参见刘亚洲《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人民网,2015年10月8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008/c136457-27672900.html>。

可作以下具体的划分与分析。

首先，日本当今的作为对中国崛起环境确有较大负面影响：（1）按领域来划分。军事安全上，对华的威慑与威胁，负能量性质明显；经济上，开始有日渐激烈的竞争；外交上，牵制、竞争态势明显。（2）按重大事态划分。中国崛起障碍被认为有三大类：一是中国与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例如日本也用“价值观外交”及软实力牵制中国，这实际上是涉及中国政治安全的问题；二是中国民族复兴及与霸权国家遏制企图抗争，特别是日美同盟体系对中国的防遏压力；三是中国发展与他国利益的冲突，例如中日领土主权及海洋争端。在这很难克服的三大矛盾中，皆有“日本因素”，且时有不减反增趋势。这三大障碍是中国顺利崛起的巨大麻烦。（3）按地理空间来分。在国际、地区多边、双边层次上，横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对中国国际形象及软实力影响、硬实力发展都造成不同影响，而利益冲突、军事威胁则持续恶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其次，对“日本威胁”的性质及程度问题，需清醒认识、平衡估量。当前，日本对中国的崛起确实造成很大麻烦和障碍，但若从大局而非单纯军事观点看，只要处理得当，当下及未来几十年内，其已难以单独对中国构成传统意义的决定性危害和致命威胁。从历史上看，这种巨大危害不止一次。但当今国与国之间关系，很难用单纯的非敌即友模式来划定，而是复杂的多面体，中日之间也不乏互惠互利、交融互嵌的一面。轻视日本固然会吃亏，但这基本不是正面冲突以及全面战争的问题。“现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可以有效反制日本企图第三次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干扰。”^① 世易事移，中国现在是有能力独立实现战略安全的大国，在战略上研判和处理对日关系时，应摆脱自信不足和“受害情结”，多显大国气度和定力。^② 当日本对中国而言没有那种致命威胁性或绝对重要性时，中日关系从客观而不是主观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所以，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最现实或更主要的已经不是日本图谋引发冲突、挑起战争的军事威胁的问题，而是来自于以下两个

^① 刘亚洲 《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2015年10月8日。

^② 实际上，只要中国有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及在生产力和文明层级上没有比日本落后一个“形态差距”（例如，完全的农业封建社会比拼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那日本就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大陆。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是中日国力差距最大的一段时期，但日本也没能完全击垮并征服中国。不夸张地说，那应是有史以来日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可能征服中国的机会。从全球化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环境来看，中国已经不可能出现像清朝那样昏庸无能的政府，中国人民也不会容许国家分裂。

一急一缓、一近一远的事态。

第一，在东海和第一岛链的海空域，双方确有爆发不测危机的可能性。^①由于中日两国关系的特殊性，突发事件及紧急事态有可能使双方政府退无可退，导致事态失控、冲突升级，甚至演变为大规模武力冲突或战争。所以，需要切实推动落实中日海空联络及危机管控机制。至于“日本阴谋论”和“岛国冒险性”，即日本在第一岛链和东海引发冲突，利用日美同盟拖美下水，引发中美冲突并使中国崛起进程被打断等的相关图谋，在当代条件下不太可能实现。明确的外在因素，也极大地制约了这一情况的发生：（1）日本的经济因此将遭受极大影响，陷入混乱和萧条，所谓“损人不利己”。（2）安倍对华的真正想法，并非要早打、大打，而是总体要均势、局部抗得住。（3）安倍要出手，需有美国的坚定后援与支持，但中美之间接近于形成“双重相互确保摧毁”，美国也不会轻易被日本拉下水。（4）中国已具备足够的、日本难以承受的反制与反击能力，日本若挑起战端，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免受巨创、脱身而退。

第二，日本的“软制衡”与“干扰消耗战”的长期危害性可能更大。这主要有三种情形：（1）对华展开围绕体系与秩序的较量。日本以中国不“遵规守则”为理由，以“民主国家”同盟或海洋国家联盟的方式，展开围华、制华之策；或者，阻扰或消极抵制中国发起主导的地区合作倡议，另起 TPP 等机制，反对中国主导的规则建构和秩序建设等。（2）推动紧盯中国的恶性经济竞争。日本调整投资方向、转移制造业基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位置，侵蚀中国产业国际市场份额，增加中国“走出去”以及实施“带路构想”的成本。这关系到中国的转型升级动力强弱，以及在亚洲地区的立身基础和战略资本。（3）开展国际宣传及负面报道，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长期损耗中国崛起所需的软实力基础。

当今时代，比起传统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机制与规则构建、国际话语权等，更能影响一国崛起进程。以上三点软制衡举措，使得中国的崛起过程难度系数增加，在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中需要付出比设想多的资源和国力。最终使中国成为一个大而不强、未富先衰的非发达大国，这可能被日本认为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格局。并且，日本政治精英及统治集团，可能在较长一

^① 如果未来日本追随美国强力干预南海争端及海上交通安全，中日也有冲突可能，但这尚未成为当前的危机。

段时期，在战略和安全上决意要和中国对峙、缠斗的意志并不薄弱。中国不应低估日本决策层及政治精英的坚韧性及战略忍耐力，在面对周期性崛起并强大的中国、自己处于一定的劣势时，日本并不缺乏周旋与博弈的历史经验、政治智慧，也不乏战略忍耐与实用主义的灵活手段，甚至主动设计、积极经营的意识。^① 安倍笑脸式“两面人”的两手做法，即是明证。

（三）应把握的三个关系互动及行为特性

在此大判断下，进一步看清以下三个事实，对认识当前的中日关系、界定双方之间的外交政策效力的作用边际，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意义。

第一，是与“和而不同、斗而不破”有关，中日间的和平与稳定关系从理论上讲可以实现，前提是要做好双边互动与危机管控工作。中日关系在中短期内很难真正友好起来，“好不到哪儿去”确属事实，为了友好而友好或曰为了友好而单方面让步的情况，已很难发生。^② 友好实属不易，但和平不难，稳定可期。中日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并保持和平状态的可能性很大。当代“大国无战争”的一般法则适用于中日两国，并且历史上东亚地区不似欧洲，各国有长时间保持和平共处的历史经验，环境条件具备时，中日之间也往往有数百年的和平局面。当然，理论上的和平与“坏不到哪儿去”状态，是以尽早解决并落实危机管控问题为前提的，如果对危机及突发事件的管控不善、沟通不畅，很坏的局面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进入 21 世纪后，双方在交手博弈、关系震荡多次后，都不同程度意识到“自损八百”与“鹬蚌相争”的问题。两国都在谋求民族振兴、攻坚克难的紧要关头和爬坡阶段，都须排除不利因素干扰与不必要的分心劳神，避免互损互耗而不能增加复兴正能量。所以，可以看到，中日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双方会谋求把紧张状态缓一缓、晾一晾。

第二，是与“互惠互利、往来不绝”关联，“政经分离”已成中日间无法回避的客观现象。中国在这种双边关系模式中也可以有坚持底线与红线、以两手对两手、引领政策互动并维护国家利益的相应思维与方法。造成如此局面，主要是日方有意为之——刻意将“战略互惠关系”低级化与庸俗化的后果，而非中方乐见的结果。日本政府尤其是安倍内阁，采取保持经贸互利往来但在战略上防华制华的双轨方针，这也是其从低层次上所理解的“战略

^① 谷内正太郎「安倍政権の対アジア外交・米国外交」、『東亜』2014年第1号、18頁。

^② 中日在可预见的较短时期内能否实现政治和解与政治互信？结论是不能。原因有三：（1）当代短因，日本在日美同盟制约之下；（2）中近期原因，近代历史没有得到真正清算；（3）长线而言，从古代起日本即有对“中华”的抗拒意识。

互惠”的含义。并且，从广义的政经角度来说，作为大政治的一环以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国民感情，也没有随着人财物和信息交流的扩大而同步得到改善和提升，反之却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21世纪初开始呈现螺旋下行、不断恶化的趋势。^①不过，这当中需要看到，当前的中日政经分离，性质与冷战时期日本敌视并不承认新中国、双方没有正常邦交的那种分离不同，迄今日本政府起码一再公开表示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共识，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顾及中国的反对，保有一定的克制。实际上，中日之外，这一分离与双轨现象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并不罕见，很多情况属于当代大国博弈加剧、软硬两手皆用的非典型正常关系模式的范畴。

第三，是要看到日本在战略坚持、总体固守的同时，也有战术务实、局部妥协的一面。这意味着，中日之间功能性合作和局部协调是可能的，中国越是发展壮大，这种趋向就越明显，例如在包括中国“带路构想”及投资领域的“参股分红”、地缘形势维稳方面的政策磋商、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治理上的联合贡献等。就日方而言，其官民虽对华负面认知较多、不甚服气与认同，但面对迅速崛起的“西方强邻”，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及日中关系很重要，也在想办法周旋，保持战略耐心，意图实现相安无事、趋利避害、平稳过渡。日本民族性格素有快速顺应大环境、不拒实用主义“豹变”的一面（尤其在格局及环境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精英在战略和深层次上，即便不情愿，也已不得不开始做心理调整，准备与崛起中的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并不是以其过去的惯性心理优越感为基础的关系。日本的对华观及策略战术在内外新形势下发生调整与变化，有其一定必然性。安倍政府的战略信念及意识形态，在一时一域并非不可让步于经济繁荣和商业利益之需。例如，在钓鱼岛前沿地带，也开始接受与中国共存、共巡的新常态；在亚投行问题上，安倍政府虽然表示异议并加以抵制，但其多位政要也松口表示将来要合作。^②需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日本的心态和政策调整过程以及中日关系新常态的构建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并不断调适的动态平衡进程。

^① 参见园田茂人主编《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王禹、韦平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②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时任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等政要，在某些场合都曾表示过，待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时，日本不是不会考虑以某种方式参与亚投行一事。

四、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2021年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间，可以说“现在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而中国崛起关键阶段的大部分时期与安倍二次上台后的执政期重合。以上三节的论述，基本理清了日本的综合国情和对华战略、中日关系的客观态势以及双方政策效用的边际范围。为确保中国的最主要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构建互利共赢、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样态，就需要在此基础上，正确界定并牢牢锁定对日政策目标，总结安倍二次执政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得失经验——很大程度上即是与此目标的相距远近问题，从而构筑符合实现目标要求的新时期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一）关于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战略目标

中国的对日战略目标，从国家根本战略利益和长远目标来看，应是在确保核心利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能够让“日本因素”为我所用、服务于大局，即应以争取日本不阻挠或不过分阻挠中国国家战略的实现为第一要义，使日本在中国崛起进程中尽量多地发挥正能量作用、尽量少地发挥负能量作用，不成为中国崛起路上始终相随的巨额负资产。但中短期内的中日关系，难以达到战略互信、政治友好、军事“撤防”的状态，单纯友好并非现阶段对日关系建构的现实目标和主要任务。^②

友好固然是一种理想的关系状态，但当前中日关系在难言友好的前提下开展，也不可能做到使日本必须采取对华友好的态度。中日政治关系一向很难处理，历史上也没有真正确理顺过。目前则是既有历史恩怨、也有现实利益冲突、彼此难以认同的两个大国，正在展开综合性博弈，这已是一种不正常的常态关系。双方关系的公约数定位，应是战略竞争对手+战术协调伙伴的非敌非友关系。关于中日关系的这个问题，有两点需要厘清：（1）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关系上的“友好”，与政治及安全关系上的友好，不具有一个次元的意义。出于“政治正确”，这两者常被混为一谈，并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论。

^① 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年，第35—36页。

^② 但这不代表将来不可能，或平时不用为此努力。外交战略中的现实主义政策与理想主义志向，是可以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关系。

须知,即使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战前期和战间期,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的经贸和民间关系也相当良好,但国家间关系由高阶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决定。(2)中日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短暂“友好蜜月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在两国关系的历史长河中,不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自日本学习中国、初具国家形态后,大历史中的双方关系状态(政治与安全关系)盖有三种:有外交关系,日本朝贡、但一般不接受册封;无外交关系,官方隔绝、不相往来;爆发战争,兵戎相见,关系恶化。所以,双方的政治与安全关系,长期缺少真正平等与友好的历史记录。

中国应在自身国家及全球战略棋盘上设定“日本坐标”,使中国对日外交、中日关系服务于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大局。^①要做到这些,实现政治关系基本稳定、安全关系保持和平、经贸往来正常开展、改变日本“逢中必反”,是基本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的总目标可具体分解为:政治上,不使日本在国际上对中国竭尽负面宣传之能事,不使其发挥制华、抗华的串联作用,从而影响中国崛起的软实力和友善环境;经济上,稳住其投资,不使其政府刻意推动撤资转资等,使中日经贸往来、日本技术及经验等长处有利于中国“新四化”和“五理念”的实现;^②军事安全上,第一是降低其或日美同盟对中国威胁程度,第二是要防止危机和突发事件。三大领域的目标,又可详细表述为如下六种日本对中国以及中日关系有利有益的状态:(1)国家发展上,维持相对富裕稳定及“民主机制”健全——近似于维持“现状”;(2)安全军事上,受日美同盟管辖,而不是感到安全受到威胁,开始独立核武装、拥有完全自我完结性的军事力量,同时不在西南群岛重兵布防,不导致擦枪走火而使中日发生重大武装冲突;(3)外交政策上,采取“日美同盟+日中协调”模式,具有外交平衡性,不倾注最大资源对付中国;(4)经贸往来上,按经济规律来往、互利互补,不刻意以政治意图影响经济活动(例如鼓动从华撤资、转移投资方向,以及禁止高技术输出等);(5)国民感情和认知上,多数人对中国有好感、认同感,不认为中国是威胁而缺乏安全感,不拿中国做扩军备战对象以及煽动民族主义的借口;(6)在国际多边外交场合,不大肆攻击批评中国,不渲染“中国

^① 中国国内两种政策观点(当然有共同点,如“防日”等):(1)“拉日稳日”论,日本仍很重要,不重视日本要吃亏,宜给日本位置和作用、拉住稳住日本。(2)“压日制日”论,中国GDP到日本数倍后,问题就解决了;日本不是战略力量,心怀不满却又力不从心;中美相处好,则中日无问题。

^② 新四化,是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五理念,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2、17页。

威胁论”等，不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及软实力环境，而是对华携手发挥一定大国责任、承担全球治理等国际义务。

反之，这六种的反面状态，就是对华不利并且需要避免的情况。中国对日策略应围绕此目标展开工作，从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立场出发，坚持内外两线统筹、局部服从整体，积极运筹、主动塑造中日关系的利我局面。尤其在当前及近未来一段时间，应抓紧实现可能（部分）达成的第三、第四、第六目标，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创造条件。

（二）2012年以来的中国对日关系评估

2012年中日“岛争”发生后，双边关系陷入复交以来的谷底状态。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诞生后，中日关系逐渐得以调整与转圜，部分实现企稳、改善的目标。但是，也能看到，当前中日关系的状态即政治、经济及安全上的关系状况，离上述目标设定仍有较大的距离，并且在反复震荡中有时还偏离目标。这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无疑亟需正确认识、评估和解决。

（1）对日关系大致实现不失控、不破裂的低阶目标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诞生后，“从2013年起，以着力保持与近邻各国关系稳定的周边外交战略为指导，采取了不使日中关系决定性恶化的基本方针”^①。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文件，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与“周边外交战略”有着清晰的设计和阐释，但是被认为不同程度地“失落”了中日关系，对日本的定位和作用等，看似没有明确的说法。连续几年的中国外长的有关讲话，使得日本似乎感觉到自己被降格处理或周边化的迹象。^②然而，“周边外交理念”适用于日本是题中之义（日本不是例外）。周边战略框架和理念需包含日本，“利益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意识都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广泛、重大的共同利益，睦邻友好、平等合作符合双方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强调双方的共同梦想、共同发展等等。^③这些显然无法排除日本，不能“容日”则显说服力不够。

中国并非要恢复天朝中心的等级体系，也没有打算在中短期内取西方而代之。如此来看，日本的定位或中国对日本的期望值、目标值以及政策方针，

① 添谷芳秀『安全保障を問いなおす』、NHKブックス、2016年、225頁。

② 王毅外长在连续几年的年终外交讲话中，相对于其他几对中外关系，没有过多涉及日本或中日关系。日本方面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持有疑虑。

③ 参见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96—299页。

就比较清楚了。未来10—20年中国的战略目标，应是构建部分对接日本的、与美日同盟体系可协调共治的亚洲政治经济秩序，首先完成在亚洲的和平崛起，建立共赢共享新秩序和战略依托带。中国的崛起已处于关键期，世界主要大国正将其战略重心纷纷投向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战略形势及大国博弈更加复杂化与尖锐化，维护周边和平稳定的难度在加大，经营大周边格局处于重要关头。日本作为中国周边国家、主要大国，加之其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权重，对中国推动建立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维护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构筑周边战略依托带，都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中国政府就其国际大战略进行的规划和设计，使中国外交正处在推动全球政经秩序从破到立的起步开局阶段。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深改进入关键期，其他新兴国家发展也并非顺风满帆，与发达国家间的竞争态势一时难分明暗。中国对美西方竞争及中美态势变化、改善美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曲折过程。

基于这种思路，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中日领导人会见后，中日关系出现解冻、缓和迹象，开始起步调整。这实际是中国领导层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之后，重视中日关系，力求稳定周边、构筑良性战略依托带工作的一环。周边会议及其后的中央外事会议，就中日关系“虽然没有说法，但有做法”，中国对日政策的策略和具体做法，出现微妙变化，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是服从于、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特别强调，维护中国周边和平稳定，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第一次明确的公开宣示。中国认识到，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确实存在，周边尤需稳定，需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关系。2014年比2013年、2015年比2014年，中国方策略的明显变化与进化是，该维稳的要维稳——中国实力（例如装备制造和工程技术等）上升后，维权手段及能力大幅增强，但是不能让事态失控并一路恶化下去，不能使日本完全站到中国对立面，要管控争端，不使其影响到中国的国际评价及战略大局。

中国将日本及中日关系放在大周边里或作为大周边的有机一环处理，是要达到如下两大目的：保持两国关系基本稳定，以实现周边总体稳定的重要一环；尽量保持两国正常的经贸往来，做到互利互惠，利益融合。具体的实施举措则有三条：（1）在有效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保持维权与维稳的适当平衡，适时开展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等磋商、管控分歧与争端，维护周

边安全环境，避免双方对峙过于紧张而影响中国战略大局。(2) 推动双边经贸往来及民间关系的改善与正常化，开展互惠互利，以经贸为发力工具，加强利益融合，形成双边利益共同体。即便双边暂时难以形成“命运共同体”，利益的深度互嵌也是正能量影响因素。(3) 推动或倡导中日韩自贸（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FTAAP）建设，把日本拉进地区合作网络中，使日本一只脚踏进来或半个屁股坐在东亚或东北亚这边。双方认可的地区安全秩序虽不兼容，但经济秩序或规则部分可以先融通、融合起来。日本的另一只脚踏在 TPP、日欧 EPA 那边，对中国也并非零和之举。如果日本的利益大头在东亚，嵌在中日都有股份的区域体系里，那么在政治安全关系上，其对华政策倾向多少会有顾忌和收敛。

(2) 以“周边”及“带路”视域处理中日关系存有局限性

2012 年安倍二次上台执政以来，中日关系陷入恶化僵局、中国崛起环境不免“受伤”。因为同期中俄、中欧、中印甚至中美等几对主要关系并无如此情况。恰逢中国崛起关键期，中日关系如此恶化并陷入僵局、日本方面如此“闹腾”，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需要准确认识和评估。中日关系“非正常现象”，作用大、影响坏，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确保当然不利。

中国的目标是构筑一个为中国复兴崛起服务的整体战略依托带，这个构想有两个特点：一是十八大及周边工作会议以来，把中国的周边作为整体区域来考虑和设计；二是战略依托带应成为比较稳定友好（至少相对友善）、繁荣的区域。

“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周边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和延伸，被认为是中国当前最主要的国际战略，其与日本的关联，引起了不少的议论和猜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厘清，那么对日政策或中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不落地”和“拖后腿”之嫌。需要看到的是，将日本“周边化”即仅仅把中日关系放在周边框架内加以一揽子考虑的思路，有其局限性，短期看难以解决两国问题，也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及举措，有与日本及中日关系兼容或对接的部分，但不兼容或相排斥的部分也较明显。日本将中国的周边外交构想及带路倡议看做是中国试图主导东亚秩序构建并进而谋取地区主导权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因而对此拒绝的部分也很多、排斥的反应非常明显。^① 中国对周边其他国家的政策效果，在日本这一自我定位为“西方一员”、具有

^① 白石隆『海洋アジアVS大陸アジア』、ミネルバ書房、2016年、24—36頁、81—130頁。

全球重要影响的地区大国身上可能难以充分达成或得到体现。

中国的周边外交大战略（包括带路构想）对中日关系而言，总的问题是四大不对接或不兼容现象，即在观念、秩序、经济、安全四个层面的排斥难题：（1）对“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理念，日本在思想及情感上表示不相信、不认同、不接受。（2）地区秩序的解构及重构进程中，日本对于中国主导的任何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倡议或构想，都持消极对待、拒不接受或反对抵制的态度。日本联合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政治秩序（多极化及民主化）、亚太海洋秩序（南海争端）、经贸秩序（AIB、TPP）、安全秩序（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及其扩大版）上，几乎都与中国唱对台戏，拒绝接受中国影响力和主导力。（3）经济上的“惠及周边”、“辐射四周”、让利融合、解决产能过剩及出口导向等，由于在日本经济上属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领域处于价值链上游，所以对日也不适用。（4）中国主导的周边安全合作构想和平台（CICA、SCO等）、战略安全上的新安全观，与日本竭力维系的美日同盟安全体系难以兼容，日本在安全上仍主要依靠美国，对中国持有十足的戒心和防范。^①

但是，周边战略依托带中，东部方向（西太平洋及第一岛链）是不是可以出现一大缺口，或暂时作为一种特例而不考虑作为中国崛起的依托？实情应该并非如此，否则不需要对外“积极有所作为”，至少东部方向应进一步安稳下来，即便没有好作用但负能量效应也不应过于突出，对中国崛起的损耗作用也不能像现在这么大。而且，中日关系处理好坏的一得一失、一正一反，在整个周边引起的连锁反应、乘数效应也不一样。中日、中美、中国与周边其他国家关系是有机联动的：中日关系好，周边国家在看，可以带动中国整体对外关系向上向好发展；中日关系坏，日本大搞串联，利用越、菲等东盟国家的担心部分推动“围华外交”。^②安倍二次上台执政后，日本的外交政策行为并非一无所获，增加了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这也说明中国周边外交尚有改进余地，崛起的公信力还不够。

（三）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方向与路径

以上论述表明，中日关系进入到一种两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而不同、

^① 日本对华局部协调、功能性合作、参股分红，都有可能，但（整体）支持中国主导的这一构想是不可能的。日本认为，这是一个秩序的问题，与政治、海洋、安全等其他秩序的变化相关联，这是导致地区秩序变化、中国重新主导东亚秩序的一个有机部分和动向。所以，日本的政策是“总论反对、分论协调”。

^② 例如，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及 G7 会议宣言涉及南海问题，中国东盟首脑会议宣言罕见写入中日关系，对中国而言并不是没有外交压力。

斗而不破、互利互惠、往来不绝”阶段，至少中短期内双方处于复杂的战略竞争 + 战术协调的非敌非友关系。^① 在这个阶段，双方关系构建的公约数共识是安全和平、政治稳定、经济互利、“社交”不绝，这实际上也是日方所谓“战略互惠”的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理论上可以实现的及格线目标，在现实中也未能达标。中日两个大国，陷入了战术互损而非互利互助的困境，这对两个正在图强振兴的民族实现其各自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显得很为不利。日方对这种状况，并非志得意满、无动于衷。实际上，其如意算盘，也想把战术互损关系拉回到其定义的战略互惠状态——一种抽去了友好、互信、真诚合作精神的政经分离的低阶关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及其他高官近期抛出“符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主要用意即在于此。^②

日方的对华战略思路，与中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及周边外交倡议存有明显的高度差，难以对接和兼容部分甚多。2014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等，形成了“五位一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同时，习近平也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③ 鉴于中日关系的现实，双方应夯实利益共同体格局，先期构建和平共处、健康稳定发展的中日关系，继而为走向东亚一体化和命运共同体做好阶段性的准备工作。

因而，现阶段对日关系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思维，在双方公约数共识中寻找害取其轻、利取其大的实现途径，这种思维可总结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16字方针：“和平稳定、相互尊重、良性竞争、互利共赢”。此亦为新时期、新常态下中日关系过渡阶段的总路线。按此方针循序渐进，通过长期平稳过渡、逐步趋好步骤，向一个相对友好、互信、互助的理想主义目标靠拢。

在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方面，中国应树立对日的一些理性认知和原则

① 宫家邦彦「でも敵でもない日中関係」、『産経新聞』2014年8月29日。笔者直接听到过毛里和子、垂秀夫、宫家邦彦等具有代表性的日方人士将当前的中日关系定义为“非敌非友”，他们均倾向于排除“朋友”和“敌人”的两个极端定义。

② 岸田文雄「新しい時代の日中関係」、2016年4月25日、http://www.mofa.go.jp/mofaj/a_o/c_m1/page3_001669.html。当然，岸田也提倡在可能的范围内日中对全球治理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合作。

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260—277页。

方针: (1) 两国有结构性矛盾, 有认知和利益的冲突, 相互制衡、防范在短期内难以避免, 这是不正常时期的正常现象, 重要的是须保持在一定理性和限度范围之内。(2) 危机管控机制要及时建立健全, 防止中日发生超出可预期和掌控范围的重大冲突。(3) 面对现实, 适度“政经分离”, 大力开展经济交流和务实合作, 扩大经贸往来规模, 推进面向第三方的合作, 在命运共同体达成之前, 实现双方利益深度融合、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4) 厘清并阐明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即便引起关系震荡、中国也不会让步的底线政策: 一是严重伤害全体中国民众感情的日本历史认识问题, 包括其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等, 实际上这也涉及日本将来走什么路的问题; 二是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 包括但不限于升级日台“政治关系”、公开支持“台独”等; 三是日美同盟以中国为共同假想敌并付诸行动、对中国实际造成巨大危害; 四是单方面大举打破目前“岛争”中的动态平衡局面。

新型关系构建的总体方略由三点内容构成: (1) 总体政策路径是抑害处突——包括危机管控与底线方针, 维稳增信——包括高层互动及战略磋商, 趋益融利——包括经济合作及利益交融, 促好修睦——包括民间交流及人文交往即“民亲”及“社交”工程。与前述日方的“对华四策”相对, 中方也要开展稳、用、防、竞、融的工作。^① (2) 面向未来, 尤其要推进五大促好系统工程: 增进政治互信与战略和解; 深化务实合作, 不断扩大共同利益; 大力开展人文、民间交流, 改善国民感情; 加强地区层面的沟通、协调和合作, 携手振兴亚洲; 在全球治理及解决全球课题上开展更多良性互动与合作。^② (3) 面对现实, 发展中日关系, 尤其需要务实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是两国关系中夹杂了很多历史情感及主观因素, 历史与现实交织, 时而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干扰作用。“处理中日关系, 最主要的还是需要理性, 不能老是停留在情绪阶段。”^③ 二是双方的四个政治文件, 尤其是后两个, 分别规定了33项和70项合作项目, 这是对双方都有利有益的事业。但是, 针对中日关系的实际情况, 双方也应适时开列一份“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

① 需注意的是, 对于同样的策略, 双方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一样的。譬如, 中方的“融日”方针, 目的是为将日本拉入地区合作网中, 实现共同繁荣、持久和平的局面。而日方的对华接触和融合方针, 是为了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遵规守则, 以便维护美西方的秩序霸权和既得利益。

② 参见唐家璇《继往开来, 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2012年6月26日, 参见: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626/c70731-18386636.html>。

③ 郑永年、杨丽君《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年, 第199页。

即阐明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中日之间的合作“好文件”，可能是中外、日外关系中最多的，但当前对发展中日关系而言，处突、避害、止跌等“消极合作”更具有紧迫性，也同样重要。

处理好中日关系“向新”的过渡要注意三点：（1）目标调低、力求稳进，不大起大落，不急于求成。对日关系构建，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面，也有操之过急的一面，应调到符合实情的一种状态。（2）注意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关系。维权的同时，该维稳的也要进行，不能让局面失控，应管控争端，不使其影响到整个地区环境以及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3）要看到中日新常态，是避害、维稳、趋益、向好的一个长期复杂的过渡阶段，是具有动态平衡性的演进状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日关系至少在短期内是一种战略对峙、防范与竞争的僵局，它可以得到缓和，但无法得到根本化解和解决。过去那种中日之间有了问题马上要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再发展关系或恢复交流的“即事”互动模式，已无法适用关系现状。坚决斗争、积极交往、主动引领，应是新时期中国对日交往的有理有利方式。

在新型关系状态的下一阶段，即中日力量对比变化和主观愿望调整所导致的“大共识及战略基础重建”以及“稳定结构生成”之前，中日复杂曲折的动态平衡进程或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期。在这种双边关系的格局下，中日关系发展模式中的友好、健康状态不易做到，各种麻烦、摩擦和争端盖不会少，但正面冲突和全面破裂也很难发生。所以，经过双方管控危机、凝聚共识、相互调适，和平、稳定的局面大约可以实现。对此现实，中日可在继续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力争补足“政治互信”与“安全保障”两块短板的同时，尝试建立基于新常态、共筑利益共同体、共谋地区合作及一体化的新型国家关系。

Japan and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under the “Abe Doctrine”: Building the New Pattern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Wu Huaizhong

Japan's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under the “Abe Doctrine”, along with Japan's perception of China, its China policy, the current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conception and practical ways of building the healthy Sino – Japanese relation, are all integral parts of studies of Japan and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Japan's “normalization” under the “Abe Doctrin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however,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there is little possibilities of Japan's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of its national strength and dramatic changes of

its strategic orientation. Japa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as the duality of universality in terms of neighboring relations and particularity based on Japan's own condition, becoming even more passive but has its bottom line based on its national rationality, not opposing to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cooperation of mutual benefit with China. From the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at the stage of restoring to the common status of "a strong China and a weak Japan" with new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1970s, the strateg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undergoing dramatic changes and being reshaped, implying that the conflicts and gaming will become a constant reality for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 which will neither become extremely better nor worse. In order to build the new patter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have a clear concept of objectives, carry out overall planning and actively work to shap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安倍路線」の下での日本と中日関係

—あわせて中日の新型国家関係の構築を論じる—

呉 懐中

「安倍路線」の下での日本の発展の方向性及び戦略的方向性、現在の中国に対する日本の認識及び政策、中日関係の大勢と特徴、中日両国の健全な国家間関係発展の構想と実現方法は、日本の発展の見込みと中国の日本に対する関係を研究する際の有機的な要素である。「安倍路線」で進められている日本の「普通の国」の効果は顕著である。ただし、国内外の様々な条件のため、国力の飛躍的発展と戦略の根本的变化には至っていない。日本の中国に対する認識と政策は「周辺普遍性」と「日本特殊性」の両方を備えており、日増しに消極的になりつつあるとはいえ、ボトムラインを有し、平和と互惠という低いレベルでの中日関係の構築を完全に排除したわけではない。現在、中日関係の大勢と位相は、歴史的大局から見れば相対的「中強日弱」という常態に回復しているが、新たな特徴も発生している。国交正常化後の歴史から見れば、これは戦略関係の変質及び固定化であり、両国関係の「極端な良し悪し」が容易に発生するとは言い難いが、衝突と競争は常態となり、長い期間にわたって続くことになる。一定の共通認識を踏まえたうえでの中日両国の新しい国家間関係は、来るべき新しい時期における両国にとって必要なだけでなく、実現の可能性もある。そのため、中国は目標の明確化、計画の統一化、積極的働きかけを推進していくべきである。

(责任编辑: 林昶)